

名古屋文化面面观

——半世纪来的文化变迁和发展——

鄭 麗 芸*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Nagoya

ZHENG Liyun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古以来，它持续不断地流动、变化、发展，不少原文化迁移到它国，与当地文化相遇、碰击、磨合，衍生出转型的文化，成为适应当地国情的移植文化，而这转型的文化又可能迁移它处，甚至再度回到原文化国，成为外来的新文化，继而影响其传统或原型文化。到了近代，国际贸易加速，人际交流急剧增多，各国之间的文化流动和发展变化更趋频繁，成为常态化。

日本素以接受外来文化、结合本国国情、创出转型文化而著称于世。古代日本，长时期并多方面地吸收了中国文化，特别是隋唐时期，日本大规模地接受并融合了中国文化，例如，七世纪学问僧空海留学唐朝，取法中国，后来在日本创立了众多传统文化的模式，成了“和魂汉才”日本文化的典型，对唐朝文化在日本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近代，日本大量导入西方文化，走上了具有特色的现代文化发展的道路，增添了不少东西融合的奇葩。

这种从“受容”到“变容”的日本文化，历来受到国际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美籍华人蒋彝素来对文化发展和形式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撰写的《日本画记》中对日本的文化现象作了详尽的叙述和介绍。本文拟以《日本画记》中阐述的名古屋文化为主线，探讨名古屋文化的魅力和特色，同时考察一下半个世纪来名古屋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一、东西融合的奇葩异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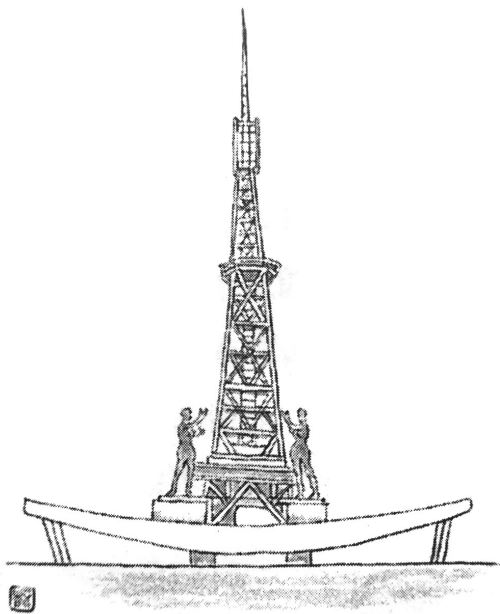
蒋彝，字仲雅，笔名哑行者，1903年出生于中国江西九江，三十年代出国去英国求学，五十年代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个著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画家。他所翻译的Coca-Cola中文名“可口可乐”，享誉全球。他在英美先后度过四十多年，足迹遍布世界，写了十多部游记作品，涉及英国、爱尔兰、法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备受欢迎，其中融入了诗书画，图文并茂，独具特色，加上他精辟的见解，成为旅行文学的经典杰作。正如蒋彝研究学者郑达博士指出的那样：“阅读蒋彝的游记作品，犹如欣赏艺术品。由于受过良好的国画训练，蒋彝具有艺术家敏锐的观察力，能够精确观察，并以高超技巧优美地记述下心中印象。”¹⁾

* 文化情報学部 メディア情報学科

1967和1968年，年届六旬的蒋彝两度访问日本，以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才华，运用现代学者的目光，加上对东西方文化慎密的观察思考，写成了这本《日本画记》，成功地勾画出日本文化的精髓，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文化。蒋彝在《我怎样写日本画记》中，曾谈到用英语写作游记的特点和困难：“我写的不称‘游记’，改称‘画记’，觉得加彩色来作插图，因要写他们的风景和习俗给读者自己看，得先把事物弄得清清楚楚，否则他们很容易指出错处的，他们的人物衣冠房屋山水，不尽与我相同，我也不能用吾国传统的山水人物花鸟去画牠，写英文不像写我本国文字容易，都是我每次写‘画记’的困难问题。”²⁾足见，除了要解决插图和文字技术层面上的困难，他还得对当地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有深刻独到的理解。这里可看出蒋彝写作态度的踏实和严谨，也昭示了他五十年前将日本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时面临的挑战。《日本画记》中介绍了日本各地许许多多的人文景观，在有关名古屋的章节中，蒋彝客观而又精辟地揭示了名古屋文化的魅力和特色，视点独特，横跨东西文化、涉猎千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史，为读者展现了半世纪前的名古屋的风采。

蒋彝当时已经在欧美生活了三十多年，他不熟悉日语，且访日时间有限，又无日本友人相随帮助，更无今天的电讯设备，但他凭借满腔创作热情和研究实力，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以及细心的观察和犀利的目光，将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写得视点敏锐，评论幽默。例如：他谈到去名古屋电视塔时，看到“铁塔附近有两尊体态丰盈，有着西方女性身材，而长着日本女人面孔的青铜裸女像”。他马上意识到，那不仅仅是造型的特别，其实它反映了西方艺术对日本艺术家的审美趣味

和艺术表现的影响，它也是当地艺术家吸收了西方的艺术方法但又极为大胆的创新之举。蒋彝在此提到著名的作家小泉八云，后者出生于希腊，后来归化日本，致力于东西方交流，撰写了有关于日本文化的专著《日本与日本人》。小泉八云曾经用“体态娇小”来概括描述日本女子，蒋彝断言，这两尊像一定会使熟悉日本文化的小泉八云先生“惊讶不已”，以此来点出此雕塑的独特性。³⁾如今青铜裸女像已不复存在，可是蒋彝的插图和评述再现了当时市景，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图1）紧接着，蒋彝以日本艺术为例，来进一步点明日本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色。名古屋电视塔附近有一幢新楼，外面挂着一块横幅“东方艺术协会首届展览会”，楼内展出的三十多幅作品全是油画。蒋彝



名古屋塔

图1 名古屋塔《日本画记》插图，蒋彝画

解释说，十八世纪的平贺源内是日本第一位采用西方绘画工具和西式技法的画家，明治维新后，许多日本人去欧洲学画。确实，艺术是跨越国界的，艺术家从各种流派中吸收适合自己的营养，从而形成独特的风格。日本先是模仿中国，后来又学习西方，从而构成了自己的面貌。在日本，目前油画十分盛行，但日本的油画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自成一派”，不再是西式风格。这些油画作品都不再是西方的油画艺术作品，它们成了日本艺术的一个部分。

二、独具一格的民族样式

承前所述，文化在流动中不断地变化发展，外部的文化传到日本后，往往融合了日本的本地文化，衍生形成转型文化，和原文化相比，它有时面目全非，以至于人们在评论转型文化时，往往会众说纷纭，百家争鸣。象征名古屋的“金鯱”（Shachi）便是一例。

“金鯱”高高屹立于名古屋城天守阁上，作为守城装饰之一的金色兽头瓦，木制贴金，重12吨，龙虎头、鱼鳞身、翘尾扑腾，神姿勃发。这两件想像中的神物深受名古屋人的喜爱，成为当地一个著名的景观。在名古屋，到处可以邂逅金鯱图案，土产、糕点、装潢、包装、纪念品、吉祥物等等。（图2）据说金鯱是1612年德川家的权力设置，并于明治时代参加维也纳博览会展览，现在的金鯱是根据原件遭战火烧毁后复制而成的。2021年曾举办“名古屋城金鯱特别展览”，将“金鯱”移到地面上，让观众得以就近一睹其神采和雄姿。近年来，随着旅游大发展，名古屋城的“金鯱”成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为此，日本旅游网站上也有了很多详细的介绍，如：名古屋城天守阁的两只金色光芒的金鯱，为头部是虎、身体是鱼的架空生物，用汉字表示就是鱼和虎的组合，即“鯱”。因为相信金鯱在建筑物发生火灾时可以喷水灭火，所以它们成了建筑物的守护神，住宅、寺院、城里都可以看到金鯱的身影。但是在十七世纪，筑城有很多规定和限制，所以设置金鯱的城阁为数不多。而名古屋城的金鯱也就变得非常珍贵。⁴⁾

“鯱”为和制汉字，即日本创造的汉字，它的中文译名不尽相同：有译成逆戟鲸或海豚的，也有译为怪鱼或动物的。

查检“鯱”字的日本字典注解，我们便会发现“鯱”字的多种解释。如：《日本語大辞典》中，海豚类的哺乳动物；想像中的鱼，兽头瓦。⁵⁾《新字源》中，海豚类的海兽；想像中的怪鱼。⁶⁾《汉语辞海》中，哺乳类，生息海中，类似小型鲸鱼；兽头瓦；兽头瓦，装饰在屋顶两端的相像中怪鱼。⁷⁾蒋彝在《日本画记》中称金鯱为海豚，在他看到名扬四海的神物时，称之为金海豚。看来，蒋彝的“海豚”之说，与《日



图2 名古屋城金鯱图案的商品广告

本語大辭典》《新字源》的第一解釋，同出一轍。

比较有意思的是，蒋彝对金海豚作了描述和介绍后，有这么一段话：“人们普遍认为，海豚拥有保护城堡免遭火灾的魔力。在基督教里，海豚是重生的象征，远远望去，名古屋的海豚雕像看上去好似中国的宫殿寺宇建筑屋顶上的龙凤雕。经证实，海豚是其中一样没有模仿中国的事物。”⁸⁾日本的古代建筑，深受中国的传统建筑影响，但蒋彝别具慧眼，看出这里的屋顶上没有袭用中国建筑常见的龙凤雕塑，而是独具匠心，以海豚替代，这显然是一种努力创新、避免亦步亦趋的实践。蒋彝指出，类似的别具一格的例子并非仅限于此。日本人专门创造了汉字“鯨”，来表示海豚，使它本地化。此外，蒋彝又强调了海豚在基督教里重生的象征意义，为这创新的形象增添了一层新的丰富内涵。

三、推陈出新的日本文化

由于文化的流动，日本接受中国的移植文化后，大胆吸收多元文化，推陈出新，创出了自身的新型文化，而这种新型文化往往超越了移植文化，令人刮目相看。日本的景泰蓝“七宝烧”的形成过程，正好见证了这种文化流动的普遍现象。

让我们来看看蒋彝有关“七宝烧”的评析：“令名古屋引以为自豪的还有另一样基础的工艺品，即日本珐琅器“七宝烧”——由落户该市的安藤七宝店生产。我对各种工艺品一直抱有兴趣，便自行前往那里参观。表示“珐琅”的日文单词是“七宝”，字面含义为“七种珍宝”，即金、银、翡翠、玛瑙、珊瑚、玻璃以及砗磲等常用材料。”⁹⁾安藤七宝店于1880年以“七宝烧”专业店创业于名古屋。(图3)而“七宝烧”烧制工艺，传说起源于中国的景泰蓝，但日本在模仿制作中，集思广益，参考西方技术，创出了富有民族风格的“七宝烧”，胎轻细腻、色泽华丽、纹样典雅，体现了日本陶瓷的民族特点和灿烂的工艺成就。蒋彝在文中特意梳理出珐琅工艺的发展轨迹，强调文化的流动性：珐琅工艺发源于公元前14世纪的希腊；后来传入中国，15世纪景泰年间成熟，即著名的景泰蓝；日本的工匠学习了中国的景泰蓝工艺，并且突破原先波斯人的制作方法，发明出自己的新的技艺和产品。蒋彝感叹道：“我观赏了所有的款式，不禁对日本珐琅器工匠们追求革新而富有创造力的头脑赞叹不已。”¹⁰⁾可见，“七宝烧”来自



图3 安藤七宝店

移植文化，通过广采西方和中国的技术，融合日本文化，诞生了辉煌的新型文化，日本的“七宝烧”，其工艺之精湛和独特，堪称独树一帜。“七宝烧”在中国享有“日本的景泰蓝”之誉，似与中国的景泰蓝并驾齐驱，甚至给人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

当然，文化发展在不断流动中变而再变。七宝烧的魅力在国际上久负盛名，北京故宫收藏了不少十九世纪末日本馈



图4 “七宝烧”装饰摆件

赠清皇室的礼品，步入现代，“七宝烧”成为国际外交中的国礼。就安藤七宝店而言，它紧跟时代步伐，五十年来，大力发展业务，不断更新商品款式，在重视继承传统工艺制作的同时，积极开发生产小型摆件、盆子、小杯、首饰、笔筒、笔盒、照相架等七宝烧日常工艺品，改进镶嵌银线等流程，使商品价廉物美、雅俗共赏，进入大众生活，为普及七宝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图4）特别是进入IT时代后，安藤七宝店更是开设会社网页，增设网购服务，打开通向世界市场的营业窗口。如今，虽然位居名古屋，却能四通八达，与国际密切接轨。这种文化流动的新样式，对于五十年前的蒋彝来说，恐怕是难以想像的。

另外，日本国技“相扑”，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移植文化改革成了日本的新型文化并在日本得到了保留。在中国，“相扑”早已消声匿迹，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溯其来源，中国春秋时代的竞技体育运动“角抵”，至秦汉时期成为相当盛行的游戏运动，晋代后又称“相扑”，十分流行，唐朝间传入日本。到了20世纪初期，日本“相扑”加以日本神道精神，得到急速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不用说，这种新型文化的日本“相扑”与中国传统的“相扑”相比，实在是大相径庭了。蒋彝认为，“日本的相扑手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为日本固有。”它还有许多特别的地方，譬如，相扑手都是“膀大腰圆，膘肥体壮”；有女性相扑手，半裸着上身相扑；有盲人相扑；甚至还有女相扑手与熊比赛。¹¹⁾

令人吃惊的是，进入21世纪，日本的“相扑”，吸引了国际上许多运动员的参加，结果，其最高等级的“横纲”竟然以身材魁梧的蒙古大力士为主将，来自欧洲各国的蓝眼高鼻的相扑手也为数不少，相扑手已不是清一色的日本人，来自不同国家的力士相聚一堂，切磋竞技，其乐融融。这证明日本的国技“相扑”在文化流动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5）“相扑”作为运动项目走向了国际化，连相扑运动员本身也趋向国际化了，这个五十年前蜚声海



图5 “相扑”茶托（2010年）

外、享有盛名的日本“相扑”，以崭新的姿态备受国际注目。与此同时，当年输出“相扑”文化的中国，如今既无社会基盘，又无发展环境，更无再输入日本“相扑”的文化土壤了。

四、传播文化的友好使者

《日本画记》中介绍名古屋的章节，题目为“名古屋与明朝陈元赞”，陈元赞成了这一章的重点，蒋彝访问名古屋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找到在日本滞留了五十年的中国学者陈元赞的墓。

陈元赞（1587-1671）出生于中国浙江杭州。字义都，有既白山人等别号，自署“大明武林”人，他是明末杰出学者，不仅善诗文、书法、绘画、建筑、制陶，还精通医药、针灸、气功、食疗等。1619年他东渡日本，长期居住下来。在日期间，先后活跃于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日本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对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如今，日本各地尚可寻访到陈元赞的遗迹，如：东京港区爱宕神社内有“起倒流拳法碑”，详细记录了陈元赞在日本创立的这一拳法的发展历史；曹洞宗正山寺还有“陈元赞先生之碑”，上书“文武之德万世传”；爱知县濑户市定光寺有陈元赞参与设计的儒教式灵庙；名古屋名城公园有陈元赞烧窑遗迹等等。正因为陈元赞的多才多艺，日本的各种辞典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介绍他的功绩，所以“陈元赞”辞条丰富多彩。如《広辞苑》中，陈元赞为诗人、陶工，拳法优秀。《大辞泉》中，称他传授了中国拳法。进而在“元赞烧”条目介绍了他用濑户陶土制作的陶艺。《日本語大辞典》中，文人、陶艺优秀，有“元赞烧”之称。

蒋彝对陈元赉敬佩有加，在名古屋短暂访问期间，放弃了参拜日本三大神社之一热田神宫的机会，专程去名古屋建中寺，（图6）参拜陈元赉“高节千古”纪念碑。当他得知陈元赉之墓在该寺的墓区内，就冒着八月炎日，坐出租车赶去那里，经过一番问询，终于找到了陈元赉的墓地，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有“大明国武陵北山陈义都先生墓”，即“大明朝杭州人陈元赉之墓”。虽然年久失修，但历经三百余年，依然存在，蒋彝感到很满足。他按中国的礼节，向陈元赉之墓深深地鞠躬表示敬意。¹²⁾

蒋彝为什么会对陈元赉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蒋彝享有“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的美誉，他自从1933年去西方之后，一直致力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沟通。¹³⁾ 陈元赉的一生，也为沟通不同文化作了不懈的努力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可谓在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驱，蒋彝因此引起共鸣，惺惺相惜。夏威夷大学阪卷俊三博士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曾为陈元赉写过简短的传记。据阪卷俊三所述，陈元赉在日本期间，出版专著，介绍老子的思想，介绍袁宏道的诗作，为日本的诗歌发展做出贡献；他制作烧窑，将“元赉烧”的陶器制作工艺传授给日本；而且还推动了柔术的蓬勃发展。在日本，陈元赉与朱舜水一样享有很高的声望，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陈元赉是个全能型人才，既能畅谈老庄哲学，又能吟诗作赋，烧制陶器，还通晓搏击技能。16、17世纪的中国学者，跟很多先前的学者一样，似乎不仅致力于儒家经典，还精通手工技艺。”¹⁴⁾ 陈元赉是一位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先人，并且尸骨都葬留在了日本。当然，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东渡日本、对日本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名士，并不少见，即使同时期同地区的就还有名医张振甫（1629-1680），他也是明朝赴日，因其医术高超，饮誉其时，名古屋千种区“振甫町”的町名就是取其名而命名的，并沿用至今。蒋彝的名古屋一章中聚焦陈元赉，籍此强调日中人文交流，关注两国文化传承。力求揭示日本文化的深层，可谓用心良苦。如果说，陈元赉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为日本文化发展，竭尽全力，功不可没，那么，蒋彝将其功绩介绍给西方读者，并身体力行地解读日本文化，搭起了东西文化的研究桥梁，承前启后，同样功绩非凡。两位传播中日文化的友好使者，为推进和弘扬日本文化作出的努力，可谓异曲同工。

忆昔抚今，五十年前，蒋彝访问名古屋时，陈元赉尚鲜为人知。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歌颂陈元赉功绩的活动与日俱增，有组织参观陈元赉纪念碑的，也有2021年6月9日举办去世350周年纪念活动的，更有介绍陈元赉的讲座，有潜心研究陈元赉生平和功绩的学者，建中寺也有热心这一题材的相关人士，还有在日本的年轻中国学者，以研究陈元赉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对陈元赉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研究，¹⁵⁾ 特别是“陈元赉研究会”的诞生，为今后有关的研究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真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今天，我们对前辈先人帮助沟通文化的努力和历史，大力彰显。蒋彝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欣慰不已的。



图6 建中寺“陈元赉墓所”

蒋彝在“名古屋和陈元赓”这一章结尾部分写道，许多中国人和西方人认为日本抄袭中国的文化，而不去研究他们如何学习外来文化的。他说，“日本人在这一要点上的天赋值得佩服。”¹⁶⁾他甚至于说：“我不会将日本人当成是中国或西方文化的抄袭者。反之，我对他们的心灵手巧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敬佩有加。”¹⁷⁾蒋彝不光是在为日本如何吸收外来文化澄清事实，他还在提醒我们，吸收文化的正确方法，不是盲目的照搬，而是根据需要有取舍的吸收营养。

蒋彝通过《日本画记》记下了他在日本的感动、感悟、感受和感想，五十年后，日本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当我们重新品读《日本画记》时，非但没有时过境迁之嫌，还常常为其独特的观察和评析，拍案叫绝，这不仅是因为图文并茂，史料丰富，也不仅仅是因为见解独到、令人大开眼界，而是因为文化流动这个课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蒋彝不仅为我们介绍了半世纪前的名古屋文化，更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思考导向和探索方法，指引我们探访日本，解读名古屋文化的今昔，启示和激励我们不断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注

- 1) 郑达〈以中国眼 记西方景〉第7页，《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17日
- 2) 蒋彝〈我怎样写日本画记〉《南洋商报》第31版，1970年1月1日
- 3) 蒋彝《日本画记》（梁贝特译，中译本）第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
- 4) 参照「街のシンボル『金のしゃちほこ』を見に、名古屋城へ行こう」MATCHA, <https://matcha-jp.com/jp/1595>，阅览日2021年11月12日
- 5) 见《日本語大辞典》“鯪”第893页，講談社1989年
- 6) 见《新字源》“鯪”第1146页，角川書店1986年
- 7) 见《漢辞海》“鯪”第1614页，“銓”第1489页，三省堂2006年
- 8) 同注3)，第90页
- 9) 同注3)，第98页
- 10) 同注3)，第99页
- 11) 同注3)，第96页
- 12) 陈元赓墓碑现在平和公园，上面的碑文为“大明国武林既白山陈广学元赓”，据建中寺主持村上真瑞介绍，此墓碑乃原碑。可是碑文与蒋彝书中的记录有明显区别。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待进一步考查。
- 13) 郑达〈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 14) 同注3)，第94页
- 15) 例如，李麗「陳元赓の『天心聖心一致』論」『名古屋大學中國哲學論集』第18号，第91-117页，2019年
- 16) 同注3)，第100页
- 17) 同注3)，第100页

参考文献

蒋彝著、梁贝特译《日本画记》（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

名古屋文化面面观

蒋彝〈我怎样写日本画记〉《南洋商报》1970年1月1日

郑达〈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郑达《西行画记》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

郑达〈以中国眼 记西方景〉《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17日